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7.06.008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经济效应的超边际分析

周维良,刘敏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珠海 519090)

摘要:为了研究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原因及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建立了制造业和贸易服务业的分工模型,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对贸易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分工现象进行了阐释和比较静态推演,预测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企业对地区经济结构和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条件、对策。研究表明:在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影响因素中,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是根本原因,互联网基础设施改善引致的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是重要原因,引致的外贸服务市场融资成本降低是促进因素,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诱因。外贸服务提供商的数量与中小制造企业的数量取决于市场交易效率或企业的效用偏好,二者分工格局的形成受生产技术水平和企业效用偏好的影响。

关键词: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交易效率;超边际分析

中图分类号:F75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7)06-0057-11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网络技术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当前我国外贸服务业出现多个以提供外贸综合服务为主要业务内容的新兴行业经济组织,其中以义乌区域国际化综合贸易平台和深圳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为代表。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提供的业务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中间商的业务范围,包括了订货、通关、退税、融资、结算、物流等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的服务,为外贸企业提供了办理进出口业务所需的全方位服务^[1]。2015年,作为唯一一个跻身进出口总额前十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企业——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其展现的外贸新业态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从平台用户与平台服务提供商双方的业务关系来看,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是一个多功能的中间商,中小外贸企业将与贸易相关的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平台,而与贸易相关的核心业务则保留在企业内,双方形成明确的分工关系。从双方的法律关系来看,既有居间合同关系,也有委托代

理关系。那么,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因何而兴起,中小外贸企业与平台企业的分工是如何形成的?在我国加工贸易产业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它的出现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区域经济发展有何效应?在我国大力开辟“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研究这个问题具有现实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企业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假设创造财富的全部活动都涉及某种合同形式,试图解释某些企业活动通过市场协作更好而某些企业活动通过企业层级进行更好。由于这些活动的特征不同,参与各方采取的合同形式也不相同(威廉姆森,1975,1981;科斯,1991)^[2-4],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相应匹配的合同结构须与企业活动相协调(Kurt和Johann,2005)^[5]。企业业务外包以合同的形式存在,利用了市场协作,它是企业把先前内部实现的活动签约给外部承接者来完成的一种市场组织形式(Domberger,1998)^[6]。企业的部分业务外包导致生产活动范围缩小,形成生产活动的聚焦。当前中小型外贸企业将其经营

收稿日期:2017-10-15

作者简介:周维良(1972-),男,湖北应城人,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暨南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供应链与国际贸易;刘敏(1976-),女,湖北潜江人,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优化。

活动聚焦于核心业务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时,就生产贸易环节的“做和买”进行了决策,但这只能解释中小外贸企业在现有交易成本条件下进行了最优决策,并不能解释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为什么会存在。由于专业化与分工水平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不是内生变量,新古典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不能从分工视角解释专职接包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出现的机理,也就不能解释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含义(庞春,2010)^[7]。新兴古典经济学引入交易费用和生产的成本,将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容量内生,复活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在这一点上,选择其来解释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企业的出现机理及对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更有力。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依托电子商务为平台开展业务,本质是跨境电商,有关电子商务的研究结果也适用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由于电子商务涉及到网络决策,斯密框架内网络决策的超边际分析对于理解电子商务现象是不可或缺的^[8]。目前有关网络电商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两类范式,一类以理论模型为主,主要以新兴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研究。数学形式上超边际分析包括全部非经典的允许角点解的数学规划,这种分析方法在1950年代由数学家开发并被Koopman、Arrow等人在1950—1960年代应用于经济学,将超边际分析和斯密的分工框架相结合就于1980年代产生了超边际经济学,在此基础上杨小凯(1991)提出劳动分工的超边际分析法,后经文玫(1996)发展使之得以在更为一般的条件下运用^[8]。超边际分析的逻辑如下:经济中的决策分为两类,一类是分配资源多少给预先决定的经济活动,这类决策是边际决策,一类是分配资源到哪种经济活动的决策,这类决策是超边际决策。人们在经济活动决策时,先将不同选择的可能的成本和收益作比较,权衡后选择总效用最大的那一种经济活动。经济决策的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利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①;其次,对剩下的每一个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最后,比较各角点解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从而产生整体最优解。

Mei(2004)^[9]研究了电子商务对生产率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发现由于专业化生产和更高贸易水平

的网络设施共享的原因,电子商务能提高其他部门生产率和贸易依赖,网络部门的发展降低电子商务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并引起经济结构波动。陈怀平和张强(2010)^[10]从专业化分工角度研究了企业内部服务共享的经济学机理及益处,发现公司内部服务共享的组织创新能够使公司加强核心业务的竞争力。李立祥等(2012)^[11]从交易、支付、物流服务分工的角度建立电子商务模式决策模型,采用Lagrange乘子法和超边际分析法求解,发现只有当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并且管理费用系数充分小时,电子商务的交易、支付、物流服务才会由企业自给自足模式演进到完全分工模式,并导致处于电子商务产业顶层位的第三方平台(淘宝、支付宝等)出现。江永宏、汪江、赵永亮(2015)^[12]基于Becker-Murphy的模块化分工理论阐述了外贸综合服务业出现的原因及意义,认为中小企业将外贸服务外包有利于外贸流程服务分工深化和价值提升,促进外贸服务业的知识增长。

另一类研究范式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对象为互联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由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以互联网作为业务运营的技术工具,互联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也因此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有关。王健(2005)^[13]是国内较早研究中国外贸企业应用互联网的学者,分别在1999年、2000年和2004年三次对外贸企业的电子商务现状进行了调研和统计分析,发现当时的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外贸企业从事商务活动的基础设施,企业网络应用的目标也呈多样化趋势,不同类型的企业对网络的商业价值和商业应用的认识程度不同,但对网络的应用还主要停留在管理效率提升和市场信息获取方面。生产型企业更注重网络在内部管理上的价值而贸易型企业更注重网络提供的贸易机会的价值,整体来说,限于当时的技术和投资等多方面因素,互联网在外贸企业的应用程度不高,其商业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发掘。Moodley(2002)^[14]、Freund等(2004)^[15]、Bojnec等(2009,2010)^[16-17]、Clarke等(2006,2008)^[18-19]、何勇和陈新光(2015)^[20]、Salmani等(2013)^[21]、Lin(2015)^[22]分别以网络主机数量、互联网用户数量、互联网接入等方面的指标研究了互联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发现了互联网应用扩张与国际贸易存在正向关系。

与上述实证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采用理论模型的分析方法,与已有理论模型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

从中小外贸企业之间进行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进行分工的视角研究中小外贸企业外部的贸易服务共享,将研究聚焦于综合服务平台出现的经济机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过程中既不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承包视为一种国际贸易模式,也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跨境电子商务模式,而是将其视为国际贸易分工产生的一种经济组织,分析其生发机理及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的建议。

二、中小外贸企业与综合服务平台的分工模型

(一)模型假设

整个社会有 M 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中小外贸企业),其集合为连续统,每个企业的禀赋和时间禀赋完全相同,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作为生产者,企业既可以选择自己独立完成所有的生产与贸易服务环节,也可以选择将部分生产或贸易服务环节发包,留下核心的业务部分,还可以选择承接其他企业的外包项目,完成产品或服务的一个或几个价值链环节;作为消费者,企业既可以自己消费自己的生产与贸易服务,也可以选择向专业生产者与贸易服务商购买产品或贸易服务。外贸货物的生产流通包括两个环节:生产与贸易服务,这两个环节使得最终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 x 、 y 为每个企业的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自足自给量, x^d 、 y^d 为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购买量, x^s 、 y^s 为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供给量。中小外贸企业效用的获得来自于对产品和贸易服务的消费,假定企业的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则企业的决策问题为:

$$\begin{cases} \max_{x,y} U = (x + kx^d)^\alpha (y + ky^d)^{1-\alpha} \\ \text{s.t.} \quad x^p = x + x^s = l_x^a \\ y^p = y + y^s = l_y^b \\ a > 1, b > 1 \\ l_x + l_y = 1 \\ p_x x^s + p_y y^s = p_x x^d + p_y y^d \\ x, x^s, x^d, y, y^s, y^d, l_x, l_y \geq 0 \end{cases} \quad (1)$$

其中, k 为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kx^d 、 ky^d 为单个企业从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购买中收到的数量, α 和 $1-\alpha$ 分别为产品消费和贸易服务消费的贡献份额。 k 的值与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程度、运输条件以及一般的体制环境有关(杨小凯,2003)^[23]。 x^p

和 y^p 分别表示产品和贸易服务的生产量, x^s 和 y^s 为产品和贸易服务的售卖量, l_i 是企业用于生产 $i(=x,y)$ 的劳动量,也是生产 i 的专业化水平, p_i 为商品 i 的价格, a 和 b 表示生产或贸易服务的技术水平。

(二)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根据文定理及预算约束和正效用要求可知必须考虑的0与正值变量的组合即模型的决策模式共3个。

1. 工贸一体化经营模式A。这种模式下外贸产品的生产与贸易全部在中小外贸企业内部进行,产品的生产、通关、货款结算、运输、核销退税等业务环节全部由外贸企业独自承担,不进行分包。模式A意味着 $x, y, l_x, l_y > 0$, $x^s = x^d = y^s = y^d = 0$,生产和贸易服务全部买卖量为0而自给量为正。A模式的决策问题为:

$$\begin{cases} \max_{x,y,l_x,l_y} U = x^\alpha y^{1-\alpha} \\ \text{s.t.} \quad x = l_x^a \\ y = l_y^b \\ l_x + l_y = 1 \end{cases} \quad (2)$$

模型的最优解

$$l_x = \frac{a\alpha}{a\alpha + b(1-\alpha)}, l_y = \frac{b(1-\alpha)}{a\alpha + b(1-\alpha)},$$

$$x = \left[\frac{a\alpha}{a\alpha + b(1-\alpha)} \right]^a, y = \left[\frac{b(1-\alpha)}{a\alpha + b(1-\alpha)} \right]^b, \text{最大效用值也}$$

即企业真实收入为:

$$u(A) = \left[\frac{a\alpha}{a\alpha + b(1-\alpha)} \right]^\alpha \cdot \left[\frac{b(1-\alpha)}{a\alpha + b(1-\alpha)} \right]^{(1-\alpha)}$$

2. 分业经营模式 x/y 。这种模式下中小外贸企业专业生产并售卖产品,不参与产品贸易服务活动,转而向其他企业购买产品的通关、货款结算、运输、核销退税等贸易服务,可称为制造专业化模式。模式 x/y 意味着 $x, x^s, y^d, l_x > 0$, $y = x^d = y^s = l_y = 0$,贸易服务的自给量为0而买卖量为正。模式 x/y 的决策问题为:

$$\begin{cases} \max_{x,x^s} U = x^\alpha (ky^d)^{1-\alpha} \\ \text{s.t.} \quad x + x^s = l_x^a \\ a > 1 \\ l_x = 1 \\ p_y y^d = p_x x^s \end{cases} \quad (3)$$

最优解 $x^s = 1 - \alpha$, $y^d = \frac{p_x(1-\alpha)}{p_y}$,企业真实收入

$$u_x = a \left[\frac{kp_x(1-\alpha)}{p_y} \right]^{1-\alpha}$$

3. 分业经营模式 y/x 。这种模式下中小外贸企业不参与生产,产品交由其他企业专业化生产,本企业向其购买,可称为贸易服务专业化模式。 y/x 模式意味着 $y, y^s, x^d, l_y > 0, x = x^s = y^d = l_x = 0$, 产品生产的自给量为0而买卖量为正。模式 y/x 的决策问题为:

$$\begin{cases} \max_{y, y^s, y^d} U = y^{1-\alpha} (kx^d)^\alpha \\ s.t. \quad y + y^s = l_y^b \\ \quad b > 1 \\ \quad l_y = 1 \\ \quad p_x x^d = p_y y^s \end{cases} \quad (4)$$

最优解 $y^s = \alpha, x^d = \frac{\alpha p_y}{p_x}$, 企业真实收入

$$u_y = (1-\alpha)^{1-\alpha} \left[\frac{k\alpha p_y}{p_x} \right]^\alpha$$

(三)模型的一般均衡与比较静态分析

由于6个决策变量的最优解在各个模式之间是不连续的,单个的消费者-生产者必须比较三个局部最大效用值才能决定最优角点解。

$$\text{令 } k_0 = \left\{ \frac{(a\alpha)^{\alpha a} [b(1-\alpha)]^{b(1-\alpha)}}{[\alpha + b(1-\alpha)]^{\alpha + b(1-\alpha)}} \cdot \frac{1}{\alpha^\alpha (1-\alpha)^{1-\alpha}} \right\}^{\frac{1}{2a(1-\alpha)}}$$

为市场的临界交易效率。如果 $k < k_0$, 意味着 $u_x < u_A$ 及 $u_y < u_A$, 企业将选择模式 A, 如图1; 如果 $k > k_0$, 并且 $p_x/p_y = k^{2\alpha-1}$, 此时两种分业经营模式的效用值相等但均大于工贸一体化经营模式的效用值, 企业会选择分业经营模式中任意一个进行经营, 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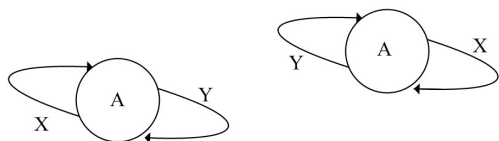


图1 工贸一体化经营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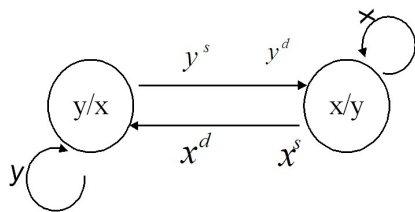


图2 分业经营模式

记M个中小外贸企业在分业经营模式 x/y 和 y/x 的分工结构为D, M_y 和 M_x 分别为从事专业化

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两类企业的数量,则D的市场出清条件为 $\frac{p_x}{p_y} = \frac{\alpha}{1-\alpha}, \frac{M_y}{M_x} = \frac{k^{2\alpha-1}(1-\alpha)}{\alpha}$, 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1: 市场交易效率是决定中小外贸企业是否选择专业化从事贸易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重要条件。如果 $k > k_0$, 中小外贸企业选择分业经营贸易服务业或制造业; 如果 $k < k_0$, 中小外贸企业选择工贸一体化经营。

命题2: 市场出清时企业的效用偏好决定产品与贸易服务的价格比。市场交易效率和企业的效用偏好共同决定了中小外贸企业中选择分业经营的企业数量分布。

证明: 分工结构D的模式下, 市场达到均衡时, 如果 $\alpha > 1/2$ 时, $p_x > p_y, M_x > M_y$ 。由于 α 为企业消费产品时获得的效用份额, $1-\alpha$ 为企业消费贸易服务时获得的效用份额, 消费组合中某一产品贡献的份额越大则表明企业对该产品越偏好。 $\alpha > 1/2$ 意味着企业从产品消费中获得的份额超过从贸易服务消费中获得的份额, 比较而言企业更偏好产品消费, 对产品的需求超过了对贸易服务的需求, 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高于贸易服务的价格, 选择分业经营 x/y 模式的企业数量多于选择分业经营 y/x 模式的企业数量。若 $\alpha < 1/2$, 则 $p_x < p_y, M_x < M_y$, 意味着企业比较偏好贸易服务的消费, 贸易服务的价格高于产品价格, 市场上选择分业经营 x/y 模式的企业数量少于选择分业经营 y/x 模式的企业数量。若 $\alpha = 1/2$ 时, 企业对产品消费和贸易服务消费同样偏好, 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相等, 两种分业经营模式的企业数量也相等。

由 M_y/M_x 的表达式可知, 分工后贸易服务提供商的数量与制造商的数量对比取决于市场交易效率以及企业效用偏好, 有:

$$\frac{d(M_y/M_x)}{d\alpha} = \frac{k^{2\alpha-1} [(1-\alpha)\ln k - 1]}{\alpha^2} < 0;$$

$$\frac{d(M_y/M_x)}{dk} = \frac{1-\alpha}{\alpha} (2\alpha-1) k^{2(\alpha-1)}$$

可知 α 与服务贸易提供商的数量和产品制造商的数量的比值成反比, M_x 上升时 M_y 相对于 M_x 下降, α 下降时 M_y 相对于 M_x 增加; $\alpha > 1/2$ 时 k 的提高进使得 M_y 相对于 M_x 增加, k 的下降使得 M_y 相对于 M_x 下降, $\alpha < 1/2$ 时 k 的提高进使得 M_y 相对于

M_x 下降, k 的下降使得 M_y 相对于 M_x 增加; $\alpha = 1/2$ 时 k 的变化不影响 M_y 与 M_x 的比值。证毕。

命题1表明市场交易效率是影响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专业化分工能否形成的关键因素,命题2表明市场价格的变化由企业效用偏好决定,市场结构的变化由企业效用偏好与交易效率共同决定。因此有如下推论:

推论1:当中小外贸企业的效用发生变化对贸易服务消费的偏好增加时,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贸易服务业,反之则反。分工均衡的条件下,当中小外贸企业的效用比较偏好贸易服务时,交易效率的增加使得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贸易服务业,交易效率的下降导致劳动力从贸易服务业回流;当中小外贸企业的效用比较偏好产品时,情况相反。如果企业偏好是中性的,交易效率变化不影响劳动力流向。

由于 b 、 α 的变化对临界交易效率 k_0 的影响不够直观,取 $a=2$ 、 $b=4$ 、 $\alpha \in (0, 1)$ 进行数值模拟考察 α 如何影响 k_0 , 得到图3;取 $b \in (1.2, 2)$ 、 $a=2$ 、 $\alpha \in \{0.2, 0.4, 0.6, 0.8\}$ 考察 b 如何影响临界交易效率 k_0 , 得到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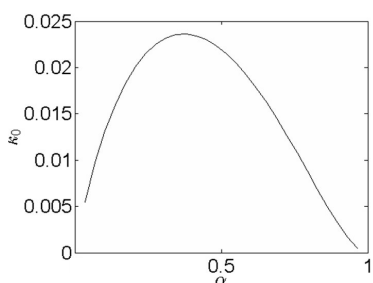


图3 企业效用偏好对临界交易效率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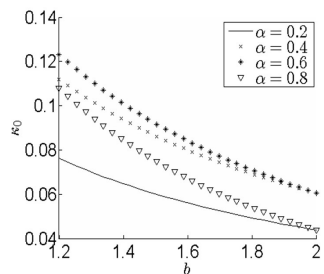


图4 贸易服务技术水平对临界交易效率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企业效用中产品贡献份额 α 较大或较小时,临界交易效率 k_0 比较小,而当 α 的值居中时, k_0 比较大,因此企业效用有明显偏好时,市场交易效率较有可能超过临界交易效率,形成制造

商和服务贸易提供商的分工格局,反之当企业效用的偏好不明显时,分工格局的形成较为困难。从图4可以看出,不管企业效用的偏好如何,随着 b 的增加, k_0 呈递减趋势,由于 b 代表贸易服务技术水平的先进程度,故贸易服务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 k_0 下降,现有交易效率条件下更有可能形成制造商和贸易服务提供商的分工。因此有命题3。

命题3:贸易服务技术水平进步降低了分工所需的交易效率临界值,现有交易效率下更容易形成中小外贸企业分业经营产品生产或贸易服务的分工格局。中小外贸企业的效用对其中一种消费比较偏好时,分工所需的临界交易效率较低,容易形成制造商与贸易服务商的分工格局;中小外贸企业的效用对两种消费的偏好接近时,分工所需的临界交易效率较高,要形成制造业和贸易服务业的分业经营模式,需要较高的市场交易效率。

三、分工模型的应用:以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为例

(一)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兴起过程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是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贸易服务的互联网企业,平台业务的本质是提供外贸中介服务。改革开放后贸易中介服务在我国长期存在,但功能比较单一,局限于传统业务范围内,为小型进出口企业提供开证、融资、报关、物流、核销、退税等代理服务。大中型的外贸企业往往自行设置进出口部门办理外贸业务及手续,不需要外贸代理服务。2004年外贸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进一步放宽了外贸行业的准入门槛,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得以进入外贸领域,行业竞争程度空前提高。同一时期,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得到极大发展,政府和各行业企业建设了各种各样的业务平台和管理平台,外贸企业可以使用平台系统的身份识别在线完成各种繁琐的进出口业务手续。这一阶段的政务平台已经开始集成联网,平台内的政策和业务管理的信息沟通开始透明化。其直接影响一是平台用户节约了办理手续的时间,缩短了生产前的准备时间和生产后的交付时间;二是由于办理贸易手续的工作量减轻,企业可以缩减劳动成本;三是由于大量的中小企业甚至个体户加入到外贸行业,生产和交易的增加引起对外贸资本的需求增加。这样平台用户的扩散意味着生产扩大、成本节约、融资需求增加,但是由于我

国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生产的扩大与资本的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是难以克服的困难,是中小企业经营活动中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

在良好的电子政务设施和电子商务设施作基础上,以义乌和深圳两地为代表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开始出现。部分中小外贸企业开始使用一达通的平台服务,但由于用户不多的缘故,一达通一直到2007年都处于亏损状态。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客户付款困难,国内出口企业生产资金匮乏,一达通服务的中小外贸企业又无法从银行获得打包贷款,一达通将平台用户的贷款需求打包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再拨付给各中小外贸企业,解决了这些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于是一达通的客户当年出现爆发式增长^[24]。

(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原因分析

1. 扩大的外贸市场需求是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出现的根本原因

斯密-杨定理表明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分工的形成依赖于市场的扩大,而分工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市场容量的扩大(Cheng 和 Yang, 2004)^[25]。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这个时间节点正值中国加入WTO,入世给中国带来了贸易规模、增速、结构、地位等方面的变化,扩大的进出口交易形成一个巨大的外贸市场,为国民经济在外贸行业的社会分工提供了经济基础,扩大的市场容量也成为专业的外贸服务提供商成长的土壤。2001年中国外贸总额为5097.7亿美元,外贸经营主体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的2004年达到11547.4亿美元,是入世前一年贸易规模的2.3倍^[26],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为25632.6亿美元,是2001年的5.03倍,到阿里巴巴收购一达通公司的2012年中国外贸总额已达38667.6亿美元,是入世当年的7.59倍^②。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成长历程,以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这种外贸行业的劳动分工组织由成立成长到崛起,2012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2.25万亿元,2015年为6.3万亿元^③。

2. 互联网基础设施提高社会交易效率是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重要原因

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降低了外贸服务市场的监管成本和交易成本。从宏观上讲,互

联网传输技术的低成本将大大降低包括搜寻、签约、监督的市场交易成本,网络通过对交易成本的影响而改变产业结构,改变企业内部结构和规模,提高政府管理国家的效率,因而互联网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引发了创新外溢(Thijs ten Raa, 2012)^[27]。从微观上讲,互联网存在实时性、互动性、跨越性、连结性、认证性和个性化六个特征,这六个方面的特征能降低企业交易的不确定性,使得交易前的搜寻、议价、缔约成本降低,事后的执行成本、监督成本降低(薛靖,2006)^[28]。一达通公司诞生于互联网勃兴之后,兴起于金融危机之时,客户的真实外贸业务通过一达通提供与各监管部门和服务企业相连通的在线业务平台办理,提高了外贸业务透明度,降低了监管方、服务方与客户自身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外贸服务市场的监管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得到了降低。

互联网降低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资产专用性,也降低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参与劳动分工时被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的风险。互联网的电子交易市场使得资产的所有者或是潜在的未来使用者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关于这项资产的用途及所有者、使用者的各项相关信息,提高了一项资产用于别的用途或者找到新的使用者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资产的专用性。从综合服务平台提供的融资服务和外贸代理服务来看,面对同质的客户群体(中小外贸企业),其提供的服务是高度同质的,这决定了其服务的提供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也决定了综合服务平台的资产专用性是相当低的。这两种业务项目的开展过程中,由于综合服务平台和各监管机构及服务方联系紧密,服务达成的可预见性也比较高,因而提供这两种服务效果的不确定性是比较低的。在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以外贸行业的分工者角色参与社会分工时被其客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的风险程度降到了最低。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降低了中小国际贸易厂商的学习成本。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由于信息交换机制的落后,以及国际市场的特殊复杂性,国际贸易停留于建立在贸易人员经验决策及人员交往基础上的主观型贸易阶段,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依靠代理销售产品。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外贸从业者有可能把主观型贸易转变为基于计算机理性决策和

电子程序办理的客观型贸易,从而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无须准备太多的专业贸易技能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对于制造型的中小企业来讲,利用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将本身不擅长的贸易服务进行外包,降低了自身的运营成本,也节省了外贸出口专业技能学习的成本,有利其聚焦于核心业务(陈铭,2003)^[29],对于贸易型的中小企业来讲,正好发挥专业贸易技能的分工比较优势,承接制造型中小企业的业务外包,逐渐转化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型的经济组织。

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由命题1可知,互联网基础设施降低了社会临界交易效率 k_0 ,提高了社会交易效率 k ,当 $k > k_0$ 时,形成了外贸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工的重要条件,因而是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重要原因。

3. 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是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有力地促进因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深了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需求,一达通的融资中介服务使得用户规模爆发式增长,公司经营扭亏为盈。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以可以追踪的真实业务为背景,降低了银行与中小外贸企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降低了坏帐的可能性,这说明以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为中介提供的小额融资市场要比银行直接向中小企业融资的市场效率更高,平台企业的介入提高了小额融资市场的帕累托效率。从信息对称的这个角度上讲,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是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介,有助于融资市场的帕累托改进,也有力地促进了自身兴起。

4. 劳动力成本上升迫使中小型外贸企业外包进出口手续是重要诱因

从外贸体制改革伊始到中国入世,在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时候,企业宁愿雇佣专职员工设立专门部门办理进出口业务手续,不愿意使用外贸代理服务,以避免商业秘密泄露、沟通不畅等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问题,进出口业务办理模式是外贸企业贸易服务的自给自足模式。当互联网大规模使用后,作为一种生产工具使得企业与客户间、企业与政府间的直接与间接沟通成本大为降低,进而通过交易成本的影响改变企业规模、企业结构、产业结构,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王宇和黄少安,2003)^[30]。尤其当其减轻了平台上企业与客户间、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后,无论是平台业务的融资还是

外贸出口业务手续外包,交易效率都高于企业自行办理的自给自足效率。而当劳动力成本也上升后,即便是大的外贸企业雇用专职员工设立专门部门办理进出口业务手续不再是经济的^④。于是企业采用外贸代理业务的外部交易市场代替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将核心业务生产留于企业内部,将非核心业务贸易服务外包给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这样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和外贸生产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就形成了。

四、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经济效应

就中小外贸企业与贸易服务提供商形成分工格局的经济效应作如下命题。

命题4:外贸行业的市场容量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扩大。

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改善,专业化分工后出现了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两个市场。自给自足模式A下,对产品和贸易服务的外部需求和供给为0;在分工模式D下,对产品和贸易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由于分工出现而增加为一个正值;自给自足模式A下,产品和贸易服务的市场个数为0,分工模式D下,产品和贸易服务的市场个数变为2个,生产和贸易服务的市场网络规模扩大了。当分工跨越国界时,市场也跨越了国界,类似于一达通这样的跨境电商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营业额,最终成为一种服务型的跨国公司。

命题5:当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时,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产品制造水平和贸易服务水平趋近于世界水平。

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劳动生产率随着专业化分工而增加,每个企业的内生比较优势增加。分工后每个专业化生产经营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分工前的 $\left[\frac{a\alpha}{a\alpha + b(1-\alpha)}\right]^{u-1}$ (<1)增加到1,贸易服务的劳动生产率从分工前的 $\left[\frac{b(1-\alpha)}{a\alpha + b(1-\alpha)}\right]^{(u-1)-1}$ (>0)下降到0;每个专业化贸易服务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分工前的 $\left[\frac{b(1-\alpha)}{a\alpha + b(1-\alpha)}\right]^{(u-1)-1}$ (<1)增加到1,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从分工前的 $\left[\frac{a\alpha}{a\alpha + b(1-\alpha)}\right]^{u-1}$ (>0)下降到0。中小外贸企业和外贸服务商出于禀赋考虑各自选择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经营,

在各自的领域越来越熟练,整个社会的生产率越来越高。当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时,贸易服务生产率水平将趋近世界水平。

命题6:交易对象、产品种类和贸易服务类型增加,形成制造业集聚和贸易服务业集聚,随着网络设施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新型外贸服务业兴起,在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越来越高。

分工使得两类企业的交易标的从0个变为2个,交易对象从0变为1,分工也使得生产贸易一体的M个企业解体为 $M_x = \frac{\alpha M}{k^{2\alpha-1}(1-\alpha)+\alpha}$ 数量的生产

企业和 $M_y = \frac{(1-\alpha)Mk^{2\alpha-1}}{k^{2\alpha-1}(1-\alpha)+\alpha}$ 数量的贸易服务企业,数量

减少了,生产和贸易服务的提供由分散转为集中,形成产业集聚,外贸企业的横向一体化程度加深,纵向一体化程度下降。分工前社会存在众多的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一体化的企业,每个企业自行融资、生产、运输、通关、核销、退税、货款结算,随着基础设施和经营制度完善,一部分企业从生产贸易服务一体化的经济中分离出来,专业化从事产品的贸易服务活动,一部分人也从制造业中转移到外贸服务业中,形成一个外贸服务的从业群体。随着包括网络在内的基础设施和外贸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显现,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将贸易服务发包给平台型企业,贸易服务行业内又派生出许多细分行业,外贸服务业占现代服务业和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

五、进一步讨论分析

就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从贸易服务业中衍生的经济机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进一步的讨论分析。

1. 贸易便利化措施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发展壮大要求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贸易便利化改革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环境。基础设施硬件方面主要是港口和道路等交通网络设施,在软件环境方面,主要包括金融机构、海关和检验检疫监管、信息技术应用、国际标准等^[31]。简化通关手续、提高港口效率、遵守国际标准等手段的共同作用,可以降低贸易商的物流成本,而遵守国际标准可以有效降低非关税壁垒,有证据表明贸易产品和服务的长期标

准化对我国的贸易总规模有正向的影响作用^[32]。因此要采取鼓励措施向企业积极推广产品和物流、金融等服务的国际标准。

2.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只是中小外贸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有效途径,要素禀赋结构才是中小企业参加国际分工的固有因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应该根据本国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这种先天的要素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外生的,但随着分工的开展和深入,本国工人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提升、生产技术的进步,外生的比较优势逐渐向内生的比较优势转化,本国开始获得专业化分工的好处。反映在分工模式D中,就是代表生产技术的指数a和代表贸易服务技术水平的指数b变大,参与分工的国家同等时间内获得更多的劳动价值。因此,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的产业分工必先考虑本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并根据分工程度动态地看待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3. 生产技术水平进步和贸易服务水平提高是推动产业分工深化和升级的关键因素。从前文的分析可知交易的临界效率 k_0 与代表生产技术的指数a和代表贸易服务技术水平的指数b有关,而且随着a、b的增大 k_0 逐渐变小,社会在现有交易效率条件下越来越容易跨过产业分工的门槛,在制造业内部和贸易服务业内部形成新的产业部门和进一步的分工。当社会分工继续演化,新的产业内部又进一步分工,新部门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使得a、b进一步增大,如此周而复始的分工演化,制造业和贸易服务业逐渐升级。因此,落后国家或地区积极寻求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既要依靠成熟技术的模仿和应用,更要重视科技研发和投入,避免“后发优势”沦为“后发劣势”。

4. 专业化技能人才的培养是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保证。索洛模型证明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H-O模型证明人力资源是一国的要素禀赋,熟练的产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的管理经营人员是后进国家利用国际分工获得“后发优势”赶超先进国家的人力保障。熟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专业技能人才提高单位产品或服务的劳动强度,相同时间内创造出更大劳动价值,获得较多的国际分工利益。

5. 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便利化是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市场交易效率k与基础设

施条件、运输条件等有关^[23]。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是贸易便利化的内容,可以节约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物流时间,减少外贸货物运输的物流成本、贸易商出行的时间成本、国际商业沟通成本,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地区供应链竞争力。地区公共基础设施越便利,市场交易成本越低,外资企业和民营资本越有可能进入,产业集聚越有可能发生,产业分工的格局也越有可能形成。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是国内市场狭小之外导致网络电信扩散缓慢的障碍^[23],而网络电信扩散缓慢又是以网络为重要媒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6. 贸易服务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需要进一步降低分工的临界交易效率 k_0 ,设立自由贸易区是降低 k_0 的贸易制度创新,有利于形成一国或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市场容量与分工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足够大的市场容量是分工的前提条件,分工进一步扩大市场容量^[8]。自由贸易区放松了行政和业务监管,成为贸易交换关系的集中地,园区内企业面临的是比国内市场容量大得多的世界市场,大的市场诱发区内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金融、贸易、咨询、租赁等现代贸易服务业的世界分工与合作,形成贸易服务业的集聚。伴随着国际范围内的扩散与回波效应,贸易服务业集聚的地区会形成一国或地区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建立模型讨论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经济现象,梳理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兴起的历史,揭示了制造业与贸易服务业分工的原理,预测了贸易服务业分工的经济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的市场交易效率低于临界交易效率时,一般均衡的结果为中小外贸企业贸易服务的工贸一体化模式;市场交易效率超过临界交易效率时,一般均衡的结果是为中小外贸企业的分业经营模式。分工均衡的条件下,市场交易效率增加时或者企业效用中对贸易服务的偏好更甚于产品的偏好,贸易服务提供商的数量增加,制造商的数量减少;情况相反时,贸易服务提供商的数量减少而制造商的数量增加。贸易服务的技术水平进步,企业效用中对产品或贸易服务两种类型的消费偏好明显,容易形成制造商与贸易服务商的分工格局。贸易服务专业化后市场容量扩大,产品生产和贸易服务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交易对

象、产品种类和贸易服务的类型增加,形成制造业集聚和贸易服务业集聚。根据结论,本文提出参与国际分工的如下对策建议:

1. 推进自由贸易区内各类政策试点。在业务内容方面,重点探索各项生产服务类型的业务,如免税物流、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离岸外汇、国际转口、仲裁以及租赁、广告、展览、认证注册、跨境电商等。在业务管理体制方面,试点进行包括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措施在内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监管制度改革创新,降低各项业务的交易成本,使得区内企业获得明显的交易效率优势。

2. 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跨境电商平台建设。为消除网络扩散障碍,政府应该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使基础设施投资来源多元化,改革电信业业务管理体制,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网络电信的市场格局,进一步改善网络设施条件。鼓励国内过剩资本投资跨境电商,走出去和海外电商合作,将部分国内目前条件下不能提供的服务功能外包给国外电商,优化本国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管理。

3. 推动出口产品标准化、进出口货物监管流程标准化、贸易服务标准国际化,学习并遵循国际规则与惯例。出口产品和贸易服务标准化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和政府的行政监督成本,但长期内会使世界市场标准对本国产品的进入壁垒消失,帮助本国厂商获得更多的国外市场,推动本国厂商与世界同行展开竞争。

4. 加强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科技研发与投入,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外贸发展走质量效益型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当前由于西方国家在大多数的工业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位,产品标准和工业技术标准也由其制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内推行符合西方经济技术规则的标准化措施,会面临国外同行厂商的强有力竞争,因此要激励工业企业与贸易服务企业在模仿外国工业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加强科技研发与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争取由世界市场标准的跟随者成为主导者。

5. 扩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与投入,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繁荣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作为劳动力投入,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要依赖于职业教育。为此需要积极扩大职业教育的对象范围,变革职业教育办学方

式,放开职业教育准入门槛,增加职业教育投入,支持职业院校培养一大批符合分工需要的产业工人和经营管理人才。

注释:

- ① 文定理:最优决策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卖一种产品。
- ② 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 ③ 数据来源为《2015—2016中国出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5—2016中国进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 ④ 2008年我国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使得用工成本上涨,“用工荒”出现。

参考文献:

- [1] 邓志新,张俊. 中小外贸企业服务外包模式探索——以深圳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为例[J]. 特区经济, 2013, (2): 204-205.
- [2] Williamson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J]. Challenge, 1975, (1): 70-72.
- [3]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1, (3): 548-577.
- [4]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5] Sartorius K, J Kirsten.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Why do Sugar Producers Outsource Sugarcane Production?[J].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2005, (1): 81-99.
- [6] Domberger S. The Contracting Organization: a Strategic Guide to Outsourcing[J].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475-476.
- [7] 庞春. 一体化、外包与经济演进:超边际-新兴古典一般均衡分析[J]. 经济研究, 2010, (3): 114-128.
- [8] Cheng W, X Yang.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f Division of Labor: A survey[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4, (2): 137-174.
- [9] Wen M. E-commerce, Productivity, and Fluctu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4, (2): 187-206.
- [10] 陈怀平,张强. 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的企业服务共享及超边际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0, (22): 170-172.
- [11] 李立祥,柴跃廷,刘义. 电子商务模式演化机理建模与经济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11): 1524-1529.
- [12] 姜永宏,汪江,赵永亮. 外贸服务业新业态的演变价值:基于分工理论的阐述[J]. 管理世界, 2015, (1): 178-179.
- [13] 王健. 中国外贸企业国际互联网应用研究[D].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5.
- [14] Moodley S. Global Market Access in the Internet Era: South Africa's Wood Furniture Industry[J]. Internet Research, 2002, (1): 31-42.
- [15] Freund C L, D Weinhold.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International Trade[J].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2004, (1): 171-189.
- [16] Bojnec S, I Ferto.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Manufacturing Trade[J].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2009, (1): 124-132.
- [17] Bojnec Š, I Ferto. Internet and international Food Industry Trade[J].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2010, (5): 744-761.
- [18] Clarke G R G, S J W. Has the Internet Increased Trad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y Evidence[J]. Economic Inquiry, 2006, 44, (3): 465-484.
- [19] Clarke G R G. Has the Internet Increased Exports for Firms from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J]. Information Economics & Policy, 2008, 20, (1): 16-37.
- [20] 何勇,陈新光. 互联网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 经济经纬, 2015, (4): 54-60.
- [21] Salmani B, Pourebrahim F, Saremi M.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Developing Countries' Case Study[C]// E-Commer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Focus on E-Security. IEEE, 2013: 1-9.
- [22] Lin F.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5, 24, (3): 1-20.
- [23] 杨小凯.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24] 郭娟. 一达通涅槃[J]. IT经理世界, 2013, (22): 32-34.
- [25] Cheng W, Yang X.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f Division of Labor: a Survey[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4, (2): 137-174.
- [26] 李邦君. 入世后中国外贸结构的新变化及其发展新趋势[J]. 国际商务研究, 2005, (3): 35-40.
- [27] 泰斯·滕亚. 投入产出分析经济学[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
- [28] 薛靖. 互联网特性与交易成本之关系研究[J]. 技术经济, 2006, (2): 69-71.
- [29] 陈铭. 互联网中介企业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的深化[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3, (1): 19-22.
- [30] 王宇,黄少安. 网络影响经济效率的方式及面临的问题[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 36-38.
- [31] 凯瑟琳·曼,张玲. 国际供应链物流与贸易便利化的宏观

- 政策[J].中国流通经济,2013,(5):46-50.
- [32] 甘聪.标准化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研[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4.
- [33] Kshetri N. Barriers to e-commerce and Competitive Busi-

ness Mode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ase Study[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2007,(4):443-452.

(责任编辑:卢君)

One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n Economic Effect of the Comprehensive Foreign Trade Service Platform

ZHOU Wei-liang, LIU Min

(Zhuhai City Polytechnic College, Zhuhai Guangdong 51909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explaining the origination of the foreign trade comprehensive service platform as one corporate organization form and its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establish a partial labor division model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rade service industry under new classic microeconomics framework, explain and make some comparative static deduction on the labor divis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rade service industry. After forecasting its influence on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we step forward to discussing the conditions and measures on which one region joi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abor division.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many factors are workable to the ris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foreign trade service platform. Among them the fundamental one is the abroad demand from joining into WTO, the important one is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leads to the lifting of market transaction efficiency, the motivating one is the decreasing of loan cost on foreign trade service market, the inducive one is the rising of labor cost. The quantity ratio of foreign trade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e SMEs is dependent on market transaction efficiency or the firm's utility preference. The formation of labor division pattern is affected by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enterprise's utility preference.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foreign service platform;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nfra-marginal analysis